笔者在亲朋好友中作过一个有趣的微型调查，询问王森是谁？多数人的回答是“不认识”或是摇摇头。但当笔者哼起“戴花要戴大红花……”一歌时，被询问的人都能接口哼起来。歌词界的同仁们称王森是一位“名不如歌”的词家，看来确实如此。

深秋临冬之时的一个上午，笔者前往上海浦东新区王森的住所，第二次拜访这位“名不如歌”的词家。记得第一次拜访王森还是 4 年前，是为了《上海歌词》杂志做他的个人专项约稿而登门的，但与他并未有深入的交谈。而这次是为写“专访”而拜访他，笔者与他愉快地畅聊了两个多小时。

久唱不衰的《听话要听党的话》

同王森的畅聊还是从他的成名作《听话要听党的话》开始的。一说起这首歌，王森还是很兴奋，一下子就打开了回忆的“闸门”。

这首歌词(其实是首新民歌)最初是在 1958 年下半年写成的，当时国内正在掀起大跃进的热潮，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快马加鞭，王森所在的上海玻璃厂同样如此。此时已热衷写诗的王森，被这场轰轰烈烈的生产大跃进场面而感染、激动，一股想为此而创作的欲望在脑海中猝之不去。有一天的下班途中，他乘坐在 73 路公共汽车上，仍思考着创作，想着想着，一首新民歌从脑海中跳了出来：“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做人要做英雄汉。”王森内心十分激动，想把它即刻写下来，可在摇晃的车厢里怎么写啊？他怕时间一长忘了这来自瞬间的“灵感”作品，所以，当车辆行驶到西藏中路福州路靠站时，王森匆匆地临时下车，直向车站对面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奔去，跨进文化宫图书馆，在服务台上，拿起供阅览人查找忆籍所用的纸和笔，迫不及待地把这四句话写在了一张小小的纸条上。

回到家里，王森仍然很兴奋，把这首作品又认真地读了几遍，觉得还是比较满意，便定名为《戴花要戴大红花》，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后，寄给了上海的某家报纸。然而，没过几天，这家报纸把此作打了“回票”。王森不甘心，又把此作投向上海的另一家报纸，结果同样是“退稿”。三番五次地投稿、退稿后，王森感到没有希望了，就把此作放进抽屉里。

直到 1959 年底，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高潮中，王森被广大工人那种忘我奋斗在工作岗位的主人公精神震撼，对工人阶级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一片真情而有了新的认知和感受，他拿出一年前写的《戴花要戴大红花》，把最后一句“做人要做英雄汉”，改成了“听话要听党的话”。这一改动，不仅使作品在押韵上形成了一致，读起来朗朗上口，更主要的是让作品在主题上得到了高度的升华，使作品的内涵与当时的国内形势和现实中的工人劳动热情紧密地联系起来，他把作品的标题改为《听话要听党的话》。

事有凑巧，作品改好没几天，正逢 1960 年元旦，上海青年宫举办“赛诗会”，王森就带着此作去参加。在“赛诗会”上，王森的此作被上海《青年报》记者看中，并在 1960 年 1 月 5 日的《青年报》上首次发表。发表的作品又被当时在上海大华仪表厂工作的工人作曲家陈锡元相中，为它插上音乐的翅膀。时隔不久，北京举行“纪念聂耳逝世 25 周年、冼星海逝世 15 周年”的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这首《听话要听党的话》歌，被上海有关部门送去参赛。直到北京发来领奖通知，王森才知道这首新民歌被入谱了曲，参加了全国比赛，且脱颖而出地获得了一等奖。

《听话要听党的话》获奖后，一度风靡全国，犹如当今的流行歌曲。上海多家报纸竞相刊载，连《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上海唱片厂还灌制成唱片，电台反复播放，参加了首届“上海之春”的演出，据说年轻人在结婚闹新房时，这首歌还成为新人“表演”节目的首选歌曲。王森回忆道：“有一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收到上海市政府的邀请，出席在市政府大礼堂 举行的文艺晚会。原来是有一个非洲访问团来沪演出，曲目中就有《听话要听党的话》这首歌。”

此歌的获奖和流行，给了王森一个新的启迪：原来诗歌不仅能吟、能诵，被谱曲后还能演唱，成为另一种文艺体裁——歌

勤耕词坛六十载

——访词作家王森

孔鸿声

词，这更进一步拓宽了他的创作思路。从此在潜心于写诗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向歌词方面靠拢，此歌也成为他转为专业词作家的起步之作。

时至今日，60 年过去了，此歌仍然久唱不衰，在群众歌咏活动中、在老人们聚会上，在卡拉 OK 娱乐中，在一些电视剧情节里，都会听到此歌。特别是此歌还飞出了境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一带十分流行，王森每年都会收到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汇来的数千元此歌的使用费，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从业余作者转身为专业作家

王森已是一位 87 岁的老人了，他 1932 年 11 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是山东阳谷县，大学攻读财经专业，1957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夜校)。读大学之前，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却没有扛过枪，一直在华东公安部队机关服役，整整当了 4 年的文化教员，因执教成绩突出，还立过三等功。1955 年 5 月他复员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动机厂任会计，工作没多久，因上海电动机厂内迁合肥，上海玻璃厂有位职工想去合肥工作，就与王森对换，所以他就到了上海玻璃厂工作，任厂校老师，主教财务课程。

从王森 1955 年发表的第一首诗歌作品算起，他的创作生涯已经度过了 60 多个春秋，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歌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文学学会会员。60 多年来，他创作的诗歌、新民歌、歌词等作品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从来没有计算过，少说也有上千首吧。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春潮曲》是同缪文心、史玉新共同合集出版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年 8 月公开发行。从 1962 年起，他先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森所创作的童诗读物《玻璃从哪里来的》、《童年》、《猴弟弟》等 6 册，其中《三件毛线衣》还由外文出版社以英、葡、斯瓦希里文出版。

从“文革”开始后不久至 1978 年，因厂校基本停课，王森先后被外借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乐团等处，从事文艺创作或组织各行各业开展文艺专场演出，如“民兵专场”、“纺织专场”、“码头工人专场”等。在此期间，还参加过由孟波牵头的一个创作组，主要成员有于之、司徒汉、倪瑞霖、朱践耳、茹银鹤、柴本尧等人，这些成员后来都成为上海诗坛或是音乐界、文艺评论界的领军人物。这个创作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创作大合唱《一代新人》，通过下基层采访先进人物、体验生活等，创作了一年多时间，作品在上海音乐厅成功上演。

也就是在外借到上海乐团一段时间后，由于创作作品较多，在 1978 年被正式调入上海乐团，成为上海词坛屈指可数的几位专业创作人员之一。王森说：“被正式调入上海乐团后，我的创作梦想如愿以偿，我的创作激情如鱼得水，真的是梦里都会笑醒。我太高兴了，创作的劲头也更加高涨了。”

调入上海乐团后，他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就是为“文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战斗片《难忘的战斗》写电影插曲。作曲家徐景新对歌词的创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歌词的要求不限，但每段歌词只能是 6 句，歌词短小才能为作曲家留有宽广的音乐创作空间。”按照徐景新的要求，王森最终创作出了只有两段体、共 78 个字的《迎着风雨去战斗》的电影插曲，随着电影的播放，这首电影插曲很快地在大街小巷里传唱开来。这一次的电影插曲创作给了王森很大的启发，使他更加懂得如何将诗歌和民歌的创作手法结合起来写歌词。此后，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先后为电影《见面礼》(黄准曲)、《白莲花》(萧玢曲)、《海之恋》(王云阶曲)、《雪孩子》(金复载曲)、《燕归来》(寄明曲)《好事多磨》(刘雁西曲)等影片写了近 30 首电影主题歌或电影插曲。

成为专业作家后，王森深入各地的采风机会多了，南疆北国去了好多地方，创作题材也更加广泛。除了电影主题歌或电影插曲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歌颂祖国美好山河、风土人情和儿童生活的歌词，深受作曲家们的欢迎。他创作的《队礼歌》(王玉田曲)也曾获全国比赛一等奖，并刊登在《红旗》杂志上，这可是不多见的。还有《让我们再当小学生》(孙承骅曲)、《分离》(侯小声曲)、《迷路的小花鸭》(汪玲曲)等，都是十分流行的歌曲。

诗词创作要注重“真、新、短、精”

对时下一些刊物所发表的不少诗词作品，王森感到有点“看不懂”，是自己年老落伍思维僵化了？还是创作形态“突飞猛进”了？总之他难得其解。王森说：“一位杂志编辑曾与他聊起过，有一些诗词作品，‘朦胧’得连编辑也理解不了到底要诉说的是什么主题。”王森认为：文艺创作的主旨在于宣传和教育，给人以正能量的接受。如果失去了这一点，就与文艺创作的主旨背道而驰了。所以，在王森的创作生涯中，他坚持在自己的诗词作品创作中，注重“真、新、短、精”四条创作理念。

一是感情要真。没有真实感情，只是无病呻吟，这样的作品是感动不了读者的。以《两地曲》为例，那是他和作曲家陆在易一起到云南采风，去了一个多月，在回沪途中与陆在易分手独自到昆明转车，离家多日的他此时想念起了妻子，心情有点难受。不大写情歌的他，也想写一首情歌来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情感，他想起了普经读过的鲁迅先生《两地书》，就提笔写出了《两地曲》一词。回沪后，这首词作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打动了作曲家朱良镇，被谱写成一首艺术歌曲，很快受到听众的喜爱，并被好多大学作为音乐的教材作品，更是有众多歌手选为参加各类声乐比赛的曲目，时止今日，《两地曲》还是东南亚地区非常得宠、盛为传唱的歌曲之一。

二是立意要新。要尽量做到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不落俗套，要给读者新鲜感。如《密林森处的歌声》一词，是王森在 1979 年 10 月与作曲家刘敦南一起去赣南山区，其主要任务是创作歌颂李四光的作品。他同地质队员们一起跋山涉水、一起风餐露宿，亲身体验到地质勘察队的那种艰苦生活，后又专门采访李四光的女儿，写出了这首立意新颖的歌词，经作曲家刘敦南谱曲后，震撼了多少听众的心灵啊。

三是篇幅要短。在王森创作的歌词作品中，大多数都是两段体，每段歌词最多 8 行，而每行歌词基本上在 10 个字以内。王森感到：无论是诗或词，不能写得太冗长，冗长就会使读者或作曲家对作品感到乏味。

四是语言要精。精准的语言才能精确地反映作品内容，体现出作品的主题。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奔向小康生活，文明和谐实现中国梦想，这样的主题，确实很难用简短的歌词来表达，而王森却用简练的新民歌体裁把它反映了出来：“改革走进岁月里，小康走进生活里，和谐走进社区里，党心走进民心里。”这首《党心走进民心里》的新民歌，经作曲家冯世全谱曲后，发表在 2011 年《歌曲》第 7 期上，被音乐圈内称为是《听话要听党的话》的姐妹歌。

六十多年的勤耕细作，王森的作品已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先后入选《啊，黄浦江》、《红旗歌谣》、《上海民歌选》、《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诗歌卷》、《1949–1979 上海儿童文学选·第二卷》、《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建国三十年声乐作品选第四分册祖国颂》等，2012 年 5 月，王森还独自出版了《王森歌词选》。

2012 年 11 月，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和上海音乐家协会，蓬王森 80 大寿之际，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联合为他举办了《听话要听党的话——王森歌词作品研讨会》，上海音乐界的众多名家徐景新、黄准、朱良镇、陈锡元、郭强辉、张世明、薛锡祥、陈念祖、胡天麟等均到场祝贺。

王森不仅作品优，人品也优，被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

(上接增版 1) 上海大众乐团成了文化中心的驻场乐团。多才多艺的他，从行政领导、排练指挥、作曲编配、钢琴伴奏等都是他一肩挑。乐团在文化中心每月举办两期音乐会，至今已举办近 300 期。每期免费的公益性演出，票子都供不应求，400 多座位的场内总是坐得满满的，不仅有附近的居民，而且有从别的社区赶来的听众。上海和国内众多颇具知名度的音乐家及国外一些音乐家也曾与大众乐团合作，在文化中心的舞台演出。沈传薪率领本团多加过八次《东方论坛与艺术系列讲座》，他认真备课，亲自讲解。十年来大众乐团还陆续在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上海音乐厅、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等举办专场音乐会，而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此团演出主题音乐会约 40 场。

沈传薪确定的立团之本是“传承与创新”。传承就要继承我国和海外优良的音乐传统。大众乐团不可能排演大部头的交响乐作品，但是可以把古今中外短小精悍、动听优美的音乐精品介绍给广大的听众。他先后指挥演出了《世界名曲交响音乐会》、《永恒的信念交响合唱音乐会》、《两岸开放探亲 30 周年纪念交响音乐会》等。为此沈传薪创作和编配了许多适合演出的作品，而且都是辛勤操劳的无私奉献，从不向团里索取报酬。不仅他自己会而忘和，甚至连他的夫人黄洪玲也被他的精神感染，自动帮他抄谱。黄洪玲原是上海歌舞团的舞蹈家，“文革”中参加跨行业的文艺小分队，与在小分队拉手风琴的沈传薪相识，最后结为伉俪。以前上音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曾给上海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上过乐理课，因而黄洪玲为沈传薪抄谱可谓得心应手。

创新就是大众乐团要有自己的原创作品。沈传薪认为没有作品可演，乐团就无法生存，如果没有新作品和自身的原创作品，乐团就更无法生存。作为经验丰富和作曲成果甚丰的作曲家，沈传薪要为本团为大众写出具有创新思维和喜闻乐见的雅俗共赏的原创作品。2010 年沈传薪选取了具有徐汇地方特色的标志性人物——我国明代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徐光启作为创作题材，联合了他的从上音作曲系毕业的女儿沈鹭一起创作了大型原创清唱剧《徐光启》。全作以《风雪对话几何学》、《抗灾救民保家乡》、《中西合璧修历法》等六部分展现了“徐汇人”——徐光启光辉灿烂的一生，首次以音乐的形式在国内纪念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及开拓中国和意大利人民友好篇章的徐光启。沈传薪在作曲时吸取了上海地区的音乐素材，揉合了意大利音乐的元素，有着鲜明的地方音乐特色，又有外国作曲技法的结晶。全作中有交响乐、合唱、独唱、朗诵和多媒体画面几种艺术表现手段的交融，新颖别致。由沈传薪指挥本团创作的清唱剧《徐光启》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预演，次年 3 月 5 日在贺绿汀音乐厅举办的《东方讲坛与艺术经典系列》和 12 月 22 日在上海音乐厅的两次演出，以及 2012 年 3 月 8 日在宛平剧院的公演，均获得了成功。有位徐姓观众看后说：“看了这新颖的表现形式和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我感到音乐很美，唱词也写得很有文学性，很有古典文学韵味。”名扬中外的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听说《徐光启》演后反响很好，她竟然冒着 38 度高温，来看《徐光启》的演出。1980 年沈传薪曾为周小燕老师办的声乐比赛，免费写过 20 首比赛歌曲的钢琴伴奏，他们师生关系非常好。所以周先生一定要亲身感受一下《徐光启》的实际效果。看了演出，周先生感慨地对沈传薪说，像《徐光启》这样好的作品太少了！《徐光启》在第 31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演出，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赏。此作还于 2011 年 5 月，由沈传薪率团在美国旧金山、盐湖城等地成功演出；2012 年 6 月他率团随徐汇区政府代表团赴韩国演出，现场观众达九千多人，当地电视台直播了实况；同年 8 月他又率团到柬埔寨访演，也引起热烈的反响和评价。这是本市民营交响乐团最早在国外的演出，创造了新纪录。《徐光启》在海内外连续演了 40 多场。其中包括到四所大专院校演出。大学生们观赏了《徐光启》和沈传薪 指挥演出、讲解的其他经典作品后，纷纷对沈传薪说，这样精彩的音乐会和清唱剧演出，我们很喜欢听，希望你们能多来。

沈传薪为本团创作的另一部作品，是大提琴协奏曲《寻梦“土山湾”》。徐家汇土山湾在 19 世纪下半叶后的近百年里，创造了多个第一的人文景观，走出了一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巨匠。土山湾这些光彩的历史，激发了沈传薪的创作想象和热情，很快这部大提琴协奏曲便脱稿诞生。乐曲叙述、歌颂、展望了土山湾的昨天、今天、明天。在第 31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演后，与清唱剧《徐光启》同获展演奖。国内外人士评价此作结构简练、曲调动听、节奏多样、配器精致，融汇了中西音乐的风格，音乐形象鲜明。2017 年沈传薪 再次为本团创作了交响组曲《南海音画》，获上海市文广局颁发的展演优秀节目奖。2018 年他为电影《医者贵任》谱写音乐，其中的主题歌《医恋》由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演唱。随后他创作了同名交响组曲，由本团演后亦获得了上海市文广局颁发的优秀节目奖。他写的清唱剧《徐光启》和交响组曲《医者贵任》都曾得到上海市文化基金会的资助。

沈传薪除指挥本团大力推进亲民音乐会外，还直接参加社会性的公益活动。2018 年 5 月 17 日，他就随上海慈善基金会到陕甘宁老区的旬邑县进行爱心支教活动。他随行来到旬邑县以习仲勋夫人齐心命名的马栏齐心学校，满怀对老区的热爱之情，为此校创作了《马栏齐心学校校歌》；为该校学生进行了一次音乐讲座；还为县里的中小学音乐老师办了一个培训班。他谢绝县里给他的报酬，体现了为大众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受到当地领导和师生，以及上海慈善基金会的称赞。

由沈传薪创建的上海大众乐团是民营交响乐团中最早成立的团体，近十年来约演出了 700 多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次。因为沈传薪强烈的责任心，并以身作则，严格治团，不计得失，从而增加了全团的凝聚力。加之李晓霞、曹鑫、顾建琴等团领导的倾心协助，以及全团成员的积极参与，上海大众乐团的发展方兴未艾，被市里有关部门评为唯一获得“AAA”资质证书的先进民营交响乐团。近日据知上海大众乐团已加盟成立不久的“陈俊阳音乐中心”，成为该中心演出队伍中的一支劲旅。沈传薪现在思考策划的是为明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时，准备率团排演一场呈现中国现代杰出作曲家作品成果的音乐会，以作为国庆的献礼！

他的交亲给他取名“传薪”，显然暗含勉励他要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发扬光大。故而在瑰丽的音乐道路上，沈传薪奋力砥砺前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已创作和发表音乐作品近千首，获奖 30 多次。但是他认为像周小燕教授所说，如何踢好下半场的足球，还得认真思考，不断努力，继续全心全意地把上海大众乐团办得更好！

小　启

本期《音讯》中“乐海人生”栏目稿挤，故临时增加两版，特此敬告读者。

《上海音讯》编辑部

在瑰丽的音乐道路上砥砺前进

——记著名作曲家、上海大众乐团团长沈传薪

万遂青

久闻国家一级作曲家、上海大众乐团团长沈传薪的大名，但缘悭一面，未能“识荆”。近日终于在徐家汇文化中心为他专设的“音乐名家工作室”见到了他。工作室不大，却充溢着浓浓的艺术气息。室内放着一架他平时作曲和配器的立式钢琴，琴上和墙上摆着或挂着许多乐团获得的奖状、奖杯、奖牌，以及乐团演出的各种海报，显现了他率领的乐团在勤奋发展的近 10 年中取得的可喜而骄人的成绩。

眼前的沈传薪中等个子，脸上架着一副朴素的眼镜，衣着整洁，显示出舞蹈家的夫人黄洪玲对他生活的悉心照顾。他虽已年过七十，然没有丝毫老态，反而给人一种年轻而干练的感觉。他谈吐文雅，身板挺直，动作利索，感情内敛。甚有艺术家沉稳从容、睿智不露的气质。

拜师名门之内　广摘作曲硕果

沈传薪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喜爱音乐，由此他自小就受到父亲给予的音乐熏陶。恰好家里有一架钢琴，五岁起他便被父亲抱上琴凳学习弹琴。他天资聪明，富有乐感，对音乐的感悟和接受能力很强，竟然在父亲的指教和教材的引导下，无师自通，逐渐把所学的乐曲弹得像模像样。

1953 年他凭着自学的钢琴弹奏和初学的乐理知识，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开办的首届附中，当时校区在漕河泾。与他同时考入附中的尚有现在名闻遐迩的指挥家陈燮阳。

自幼徜徉在音乐王国的沈传薪一考入附中，便如鱼得水，尽情畅游在音乐的海洋里。他的主课是随项信恩老师系统地学习钢琴。钢琴是他喜爱的乐器，那宽广的音域，多彩的音响，宏大的气势，丰富的表现力，无不使他着迷。项老师也非常喜欢这个天资聪明、求知欲强的学生。师生两个配合默契，一个全力授课，一个刻苦学习。经过项老师严格而正规的教学后，沈传薪 的主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其他各科成绩也很优秀。完成附中的学业，他已熟练地掌握了钢琴演奏的技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音乐修养。至今他的钢琴还弹得非常好，可以在正式的音乐会上，为独唱者、独奏者和合唱团伴奏。

1959 年在他从上音附中毕业之前，他萌生了作曲的强烈愿望，于是创作了钢琴曲《渔鼓舞》，这是根据江苏洪泽湖地区流传于渔民之中的传统民间舞蹈“渔鼓舞”的音乐写成的。1941 年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等文艺战士到洪泽湖根据地开展文化宣传时，就曾根据当地盛行的“渔鼓舞”的音乐素材，创作了《洪泽湖渔夫曲》一批作品。沈传薪亦非常喜爱洪泽湖地区的渔歌，遂写成了他的这首处女作。钢琴上明朗热情的旋律，表现的是渔民们豪迈奔放、飞舟奋进、喜获丰收的舞蹈形象。同年 12 月此作在我国乐坛重要刊物《音乐创作》上发表。

沈传薪以优异成绩升入上音本科后，更坚定了走职业作曲家道路的决心。他如愿地进入作曲系。他要用笔抒发自己的感情，表现新时代新生活的风貌。在全国享有盛誉的桑桐和陈铭志两位作曲教授，很重视他的志愿和发展，欣然把他收入门下。沈传薪有幸随两位名师深入学习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的“作曲四大件”。有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曲者之一的陈钢老师，也会代替桑桐教授给他上和声课。陈钢后来还教过沈传薪在上音作曲系学习的女儿沈鹭。所以陈钢曾诙谐地对沈鹭说：“我教了你们父女两代人。”

“名师出高徒”。沈传薪在诸多名师手把手的教育下，加之他有扎实的钢琴基础，因此他的作曲等课程都取得了好成绩，在创作作品方面具有了更加成熟的条件和实力。如同那些在学的同学就能写出精彩的作品一样，沈传薪在大学二年级时也创作了一部更显示出众作曲才华的作品。这就是他以云南民歌为素材写成的优秀钢琴组曲《云南民歌五首》。

在上民歌课时，他被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的质朴清新的感情纯真的民歌深深吸引，那些富有生活气息和多彩多姿的民歌音调，一直萦绕于他的脑海中。他向来好静不好动，可他内心却奔涌着炽烈的创作激情。云南民歌的素材，迅速在他的脑海里酝酿、扩张、变化，迅速在他灵活触键的钢琴上飞出串串风格鲜明的动听乐音。

很快他的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钢琴组曲便响亮问世，显示了他在老师们指导下，在开始的作曲道路上又跨出了坚实而可喜的一步。此部作品首演后，得到院内外人士的热烈赞赏。桑桐和陈铭志两位教授对学生沈传薪在大学二年级就能创作出如此成功的作品，也颇多欣喜和勉励。

这部钢琴组曲由《耍灯调》、《山歌》、《打夯号子》、《白族夜歌》和《放马曲》五首组成。从五首乐曲的标题，即可知是作曲家对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活精心描绘的彩色画卷。日后此曲被誉为中国钢琴文献中的一部精品。上世纪 70 年代末此曲由日本胜利唱片公司邀请香港钢琴家顾国权录制成唱片，在多国和地区流传。沈传薪的此曲不仅成了钢琴家常演的曲目，而且被编入了音乐院校的钢琴教材，各家出版社先后多次出版发行。组曲中的五首作品可单独演奏，也可一气呵成完整表现。全曲在弹奏中有许多特色。最后一首《放马曲》以多彩的音响和多变的节奏，以及豪放剽悍的民族性格，至今仍被中国音乐家协会选为钢琴考级教材第八级考级曲目，并由钢琴老师录成上课教材视频在网上传播。青年钢琴家郎朗给我国小琴童上课时，也选用了《放马歌》，还完整示范弹给孩子们听。香港的琴童钢琴选拔赛和“寻找下一个李云迪”琴童选拔赛，都把《放马歌》列为比赛曲目。此曲还被改编成古筝版和古琴版。有关沈传薪的这部组曲，至今还有音乐理论家进行研究介绍。在百度上就可查到有《沈传薪<云南民歌五首>探微》、《沈传薪<云南民歌五首>的艺术特色》、《沈传薪钢琴组曲<云南民歌五首>研究》等学术文章。

沈传薪仿佛打开了激情滚滚的创作闸门，不同体裁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他创作的钢琴协奏曲《湄公河颂》，对象征着中国与湄公河沿岸国家的深情厚谊，给予了由衷的赞美。音乐有我国民族的风味，又有异国情调。当年由上音青年钢琴家、现为钢琴系教授杨韵琳首演。

沈传薪坚持走继承国内外优秀音乐传统和扎根于民族民间音乐土壤的创作道路，坚持创作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群众听得懂的喜爱的作品。他自认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作曲家，就必须深 有不断创作和创新的热情。这是他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创作的归宿。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在欢迎宴会上，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曾任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丁芷诺在编印全国优秀小提琴曲选集时，也收入了这首小提琴曲。沈传薪意犹未尽，他最后把这首小提琴曲又扩展为与电影同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上海乐团交响乐团首演，获得好评。

改革开放以后，沈传薪以满腔热情和作曲家的高度责任感，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他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同行，不断创作出富有正能量的、接地气的、民族化的音乐作品，虽然几十年已经过去，但是在那些年代沈传薪取得的作曲成果，在作曲领域所作的贡献，仍然为人记忆，仍然值得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书写一笔。上世纪 80 年代初，沈传薪得知贺龙元帅被平反的消息，激动不已，兴奋不已。他崇敬贺龙元帅光辉的战斗业绩和高尚的精神品质，也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他衷心的爱戴。他到贺龙元帅的家乡深入生活和采风后，创作了清唱剧《迎龙桥——献给贺龙的歌》，在“上海之春”演出受到专业人士和听众的赞赏，演出的剧照被刊登在国内唯一的权威性杂志《人民音乐》封面上。

沈传薪创作的《春到太湖》、《欢乐的牧民》、《雨中西湖》等标题性的器乐曲，均以鲜明的画面感、充沛的激情和满含地方特色的艺术魅力，为听众喜爱。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应邀为第五届全运会创作的主题歌《青春曲》，歌中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生机，跳动着激情四射的轻快旋律。歌星沈小岑把此歌作为保留曲目，在南来北往的舞台上唱了三年。1987 年沈传薪为感动忆万军民的电视剧《血染的风采》创作了音乐。其中他创作的《月光啊，月光》，借皎洁的月光歌颂人民战士宽广而美好的胸怀，寄托和抒发人民群众对人民战士的无比热爱之情。插曲由军旅歌唱家董文华首唱，而后她又在军营边防为指战员多次演出。歌星韦唯也爱唱此歌，持续唱响在长城内外的舞台。《青春曲》和《月光啊，月光》两首歌，影响广泛，赞扬不绝，理所当然地都获得全国优秀歌曲奖的荣誉。他创作的风光歌曲《峨眉山上的神灯》被台湾音乐中国出版社录制成唱片发行。他的作品专辑出版发行有十多个品种，许多作品在海外传播流行。沈传薪有着旺盛的创作欲，他曾为获“大众电视”金鹰奖的《大上海出租车》、获上海国际电影节“白玉兰奖”提名奖的《第三根弦》等 30 多集电视剧作曲，因而他于 1987 年荣获上海音届文学艺术奖中的优秀电视创作奖。

报答师尊教诲　七十校庆献礼

沈传薪广摘作曲硕果之时，始终不忘老师们对他的栽培和教诲，始终想通过某种方式报答他们。十年浩劫中，恩师桑桐和陈铭志两位教授也被关入“牛棚“，被批斗冲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作为“逍遥派”的沈传薪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不断思考用什么办法，把两位老师从“牛棚”里解脱出来。1972 年国家体委慕名请沈传薪为“全国第五套儿童广播体操”写伴奏音乐。他认为这是一个报恩桑桐老师的好机会，即向委约单位提出，创作这部从未接触过的音乐体裁作品，非他一人力所能及，必须有创作经验丰富的人相助。他遂提出请尚关在“牛棚”的桑桐老师合作。由于这是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桑桐老师得以从“牛棚”出来，参与沈传薪担纲的这套广播体操音乐的创作。自此桑桐再也没进过“牛棚”，避免了更多的批斗冲击，减轻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帮助陈铭志老师出“牛棚”，沈传薪用了相同的办法。1972 年 2 月 28 日尼克松在周总理陪同下访问上海。尼克松留沪的短暂时间，要为他演出一台综艺节目，有音乐、舞蹈、杂技等。有关方面指令沈传薪统筹，设计和创作演出的串连音乐。他觉得这是一次帮助陈铭志老师出“牛棚”的最佳时机。他就向有关方面提出，组织综艺演出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不能搞砸了，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必须有老师陈铭志的参加。于是在有关方面的干预下，陈铭志老师与学生沈传薪获得处理的这次“政治任务”，并恢复了自由。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沈传薪以无奈苦涩，但又机智幽默的方式报答了两位导师的教诲。两位导师对沈传薪冒险而大力相助也心知肚明，他们彼此一直保持着忘年交的深厚情谊。1990 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沈传薪歌曲选》时，沈传薪特请已为上音院长的桑桐老师作序。桑院长高兴地命笔。他在序言中点评沈传薪所写的歌曲艺术特色是：一、深切的生活感受，广阔的题材范围；二、动人的旋律、细腻的表情；三、鲜明的民族风格，丰富的音乐语汇。一向治学严谨的待人中肯的桑院长对沈传薪歌曲创作的评价，并非走心的溢美之词，而是对学生多年在歌曲创作取得的成绩作的实事求是的称赞。饮誉国际的国面家程十发也高兴地为沈传薪此歌曲选题写了书名。

沈传薪 1973 年调入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任专业作曲，后转入上海电视台成为台里的首席作曲。1982 年他又被国家体委委约为“全国第六套儿童广播体操”作曲，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作曲任务。由他作曲的这套广播体操一直用到 1988 年。1989 年他被评为国家一级作曲。1992 年在东亚运动会举办的酒会上，他和日本流传甚广的民歌《北国之春》的词作者相识。由此作者介绍，他又认识了日本的音像制品商人黑川。经过一番交谈，黑川愿意出资与上海电视台及沈传薪合作成立“沈传薪——黑川音像有限公司”。于是沈传薪成了公司总经理，当了十年被人戏称为的“老板”。期间，他利用日方投资出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及其作品的唱片，包括他编辑出版了老师陈铭志的作品集，出版了《声乐教育十讲》在上海教育电视台播放。

他感到最有意义、做的最高兴的一件大事，是在 1997 年策划录制出版为母校——上音建校七十周年的纪念唱片集。这是沈传薪为母校有史以来策划出版的第一套唱片集。上音也很重视，专门成立了以副院长江明惇为主任的编审委员会。经过此委员会集思广益的提名和反复的切磋协商，最后确定选了上至蔷友梅、黄自、贺绿汀、丁善德，下至许舒亚、赵晓生、叶国辉、徐纪星等老中青三代校友作曲家的 67 首（部）作品或选段，编成《钢琴曲集》、《声乐曲集》、《独奏重奏曲集》和《管弦乐曲集》，形成了这四个分编的整套唱片集。从而涵盖了上音自建校后的七十年里一大批校友作曲家取得的辉煌创作硕果，为上音树立了一座为人称颂的艺术丰碑。

沈传薪在录音棚录制和编辑 好整套四张唱片集的磁带小样后，便手提四喇叭录音机和上音教务主任朱钟堂一起到医院，请卧床养病的上音院长贺绿汀审听。贺老显得十分兴奋，仔细地审听了小样的录音，称赞沈传薪为校庆七十周年纪念做了一件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他还欣然应沈传薪的要求，为上音出版的第一套唱片集题写了“岁月流韵”的总标题。沈传薪希望贺老康复后，再到录音棚听现场录音的效果，把唱片集的音效做得更好，贺老点头应允。

遗憾的是贺老未能痊愈，病情渐重，于 1999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逝世。上音和沈传薪在贺老病重时，就计划抓紧寻找音像出版社出版此套唱片集，既作为校庆七十周年的献礼，又可在贺老逝世的追悼会上哀悼贺老时作为纪念品赠送。最后沈传薪联系到中国音乐家协会音像出版社才如期出版。此作品集从策划、选择、编辑，到排练、指挥、录制、发行，沈传薪 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可谓功不可没。他自认在做“老板”期间，能为上音校友作曲家们录制了第一套唱片集，为他们首次留下了一份光辉纪录，而感到荣幸和欣慰。

创建大众乐团　奉献公益事业

沈传薪是国家一级作曲，起码可以工作到 65 岁，但是他刚满 60 岁，就毅然办了退休手续。他并不是退而休息，而是想干自己喜欢的事，想干更具社会意义的为大众服务的公益性的事。2007 年他先与陈燮阳任音乐总监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从社会招考了一批合唱爱乐者，组成了上海交响乐团附属合唱团。在社会举办了许多场公益合唱音乐会。然而对此他并不满足，认为光是一个合唱团演出显得单调，他要再建立一个颇具水平的管弦乐队，可以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凭着他是桑桐、陈铭志两位名师的高足，凭着他在上海乃至全国音乐界打拼数十年，在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广泛知名度，组建乐队的消息一经披露，正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许多离退休的和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的演奏员，纷纷投到他的麾下，有不少是一、二级演奏员。2009 年 1 月他创建了上海大众乐团，之所以取名为“大众”，是他胸怀大众、服务大众的神圣责任感和建团宗旨所致。他说自己创建的乐团不能与以提高为主的职业交响乐团相比，而是以普及为主，以更加亲民的姿态，扎根于基层，把高雅艺术通过大量普及的方式传送给人民群众，丰富和提升社会的文化生活。大众乐团有近百人的演出队伍，其中乐队演奏员 60 多人，合唱队员 30 多人。不久沈传薪任团长的大众乐团与徐家汇文化中心共同举办“社区文化与名人同行亲民音乐会”，文化中心专门为沈传薪设立了“音乐名家工作室”。

(下转增版 2)